

“青藏高原东部研究暨玉树历史遗迹学术论坛” 述评

祝铭

内容摘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玉树藏族自治州建州 70 周年，玉树州人民政府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袂于 2021 年 10 月 18-19 日在成都举办了“青藏高原东部研究暨玉树历史遗迹学术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 40 篇，来自北京、青海、四川、河北、甘肃、陕西等地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有 27 位学者在 8 场大会发言中围绕“青藏高原东部考古新发现与早期人类活动”“青藏高原东部岩画的发现与研究”“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佛教艺术中的石窟、图像与文本”“青藏高原东部的交通与路线”“三江源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等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本次论坛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学术交流的阵地，极大地促进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对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 10 月 18-19 日，“青藏高原东部研究暨玉树历史遗迹学术论坛”在成都举行。此次会议由玉树州人民政府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袂主办¹，玉树市人民政府、

1 本次论坛系玉树州人民政府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场学术论坛，首次论坛“青藏高原古塔研究论坛”于 2020 年 9 月 29-30 日在成都启雅尚国际酒店召开。

玉树州文化旅游广电局、玉树州红十字会、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共同承办，玉树市文化旅游局协办。来自北京、青海、四川、河北、甘肃、陕西等地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 40 篇²，共有 27 位学者作了大会报告。

10 月 18 日上午 9 点整，“青藏高原东部研究暨玉树历史遗迹学术论坛”在成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三楼宴会厅准时拉开帷幕。开幕式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永宪教授主持，中共玉树州委书记蔡成勇第一时间向论坛发来贺信，玉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格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对各地来宾表示欢迎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后，正式进入会议学术发言和讨论环节。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共进行了 8 场学术研讨，分别由四川大学讲席教授李水城、南京大学教授水涛、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汤惠生、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晓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四川大学教授熊文彬、玉树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甲央尼玛、兰州大学教授宗喀·漾正冈布担任会场主持。27 位报告人分别就各自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发表演讲，每场发言结束后演讲者与在场学者均进行了热烈且富有成效的讨论交流。学术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

一、青藏高原东部考古新发现与早期人类活动

近年来，青藏高原东部的考古工作持续推进，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本次会议专门设有一场专题汇报，让与会学者有充分的时间对这一领域的新发现、新进展进行展示、交流和讨论。对以青藏高原为典型代表的高海拔环境的征服，标志着人类的环境适应和全球扩散的一个重要阶段，相关研究对理解人类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是国际多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张东菊教授发表了题为《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的报告，认为最近多个考古发现将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历史由晚更新世晚期推早至晚更新世早中期和中更新世晚期，揭示在现代人之前，古老型智人——丹尼索瓦人已经生活在高原上，不仅大大延伸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而且说明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能力不是现代人所独有的。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夏河人下颌骨化石³和遗址测年

2 40 篇论文摘要的内容可参见会议组织者编辑并印发与会代表的会议摘要集。本文仅对发表演讲的学者的论文内容进行综述。

3 该发现参见 Fahu Chen, Frido Welker, Chuan-Chou Shen, et al., "A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Denisovan mandible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Nature* 569, 2019: 409-412.

及沉积物 DNA 研究⁴显示,丹尼索瓦人在距今至少 16 万年,10 万年和 6 万年,甚至可能晚至 4.5 万年,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加盆地,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甘肃永登奖俊埠 01 遗址的测年和考古遗存等分析显示,一支古人类在距今 12-9 万年,即相对温暖的末次间冰期,长时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祁连山山谷内。西藏邱桑遗址新的手脚印的发现,揭示距今 20 万年前后古人类活动在海拔 4200 米左右的高原腹地⁵。近期报道的形成于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大量手斧等的发现,为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历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证据⁶。这些新发现说明,在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古人类已经较为频繁地活跃在青藏高原周边海拔相对较低的区域,甚至也曾到达高原腹地,从而为古人类在晚更新世晚期较大范围地分布在青藏高原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发现也说明,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文化丰富多样。然而,由于除了白石崖溶洞以外,其他遗址还未发现古人类化石,因此对于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具体种属信息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吕红亮教授聚焦“人类何时、从何地进入青藏高原并永久定居下来”的问题,发表了题为《青藏高原粟作本地化与永久定居》的报告。早前的研究认为,3600BP 麦作农业的传入使得狩猎采集者有了稳定的食物资源,导致了古代人类高原的永久定居⁷。最近的青藏高原东部的一系列考古证据表明,这一模型对粟作农业的贡献有所忽视,最少在 4800BP 青藏高原东部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就已经定居高

4 该项研究参见 Dongju Zhang, Huan Xia, Fahu Chen, et al., "Denisovan DNA in Late Pleistocene sediments from Baishiya Karst Cav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Science* 370, 2020: 584-587.

5 1986 年,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章典教授在邱桑遗址发现了 19 个手脚印以及一处用火遗迹。1995 年,章典教授重返旧地考察时带回一些样本,通过光学分析方法测年证实手脚印有两万年的历史,参见 David D. Zhang, et al., "Optical dating of Tibetan human hand-and footprints An implication for the palaeoenvironment of the last glaci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Geographical Research Letters* 29 (5), 2002: 1072. 近期,梅耶(M. C. Meyer)团队在邱桑遗址进行新的科考采样分析,提出旧石器时代人类可能早在距今 7400 年到 12670 年前就在青藏高原中部地区开始了定居生活,且不需要依赖农牧业生计方式的新观点。参见 M. C. Meyer, M. S. Aldenderfer, Z. Wang, et al.,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in the early Holocene." *Science* 355, 2017: 64-67. 随后,章典团队和张东菊团队分别发表评论文章对梅耶团队观点提出质疑,参见 David D. Zhang, Sheng-Hua Li, "Comment on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in the early Holocene'." *Science* 357, 2017: 9231. Dongju Zhang, Naimeng Zhang, Jian Wang, et al. "Comment on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in the early Holocene'." *Science* 357, 2017: 8273.

6 有关皮洛遗址考古新发现参见李韵:《四川稻城皮洛遗址获重大发现——这些手斧何以惊动考古界》,《光明日报》2021 年 9 月 28 日第 008 版。

7 该观点参见 Fahu Chen, Guanghui Dong, Dongju Zhang, et al.,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347, 2015: 248-250.

原⁸。另外，将卡若、宗日遗址的粟作解释为非本地种植的交流产品的论点有待商榷，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说明高海拔地区的粟作都是贸易的产物。此外，农业对永久占据高原的作用不宜对之估计过高。世界上的其他区域不乏狩猎采集者定居高原的例子，如古代人类在南美高原的定居就很早，狩猎采集者完全可以在没有农业的情况下永久性占据一个区域⁹。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胡越博士介绍了彭卡拉玛地点的试掘报告，该地点位于青海玉树囊谦县西北约 25 公里处，是一处史前洞穴遗址，海拔约 4200 米。该地点最早由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发现，2021 年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此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前期试掘及调查。本次试掘共布 5 个 1×1m² 的探方，分别位于洞穴中部及洞口斜坡处。洞内堆积较浅，多为洞内角砾及碎屑构成，洞口斜坡处堆积较厚，可达 2 米，整体为黑色粘土夹杂角砾。此次试掘共发现石制品及陶片近千件，动物骨骼近万件，除此之外还发现少许历史时期留下的遗物。经初步判断，古人类在该地点活动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至全新世及历史时期。该地点的发现可为研究史前时期古人类进入高寒缺氧、气候多变地区的生业模式和文化特点提供研究证据。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韩芳博士介绍了参雄杂朔遗址的发掘情况¹⁰，遗址位于青海玉树治多县。参雄杂朔是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第一个进行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完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探索古人类的高海拔适应等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此次发掘共发现两个文化层，每个文化层均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少量动物骨骼碎片和古人类用火遗存。研究表明，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品包括石片-石核技术与细石叶技术体系产品。其中，废片类产品为主要的石制品类型，细石叶工艺中，楔形细石核技术突出。石制品石料选择相对单一，主要为来自通天河流域的硅质岩。年代学研究显示，古人类对该遗址的利用集中在距今 8000-7000 年，结合石制品的类型与技术特征、石料利用、遗址利用及古环境变化背景等，推测参雄杂朔遗址

8 参见 Xiaoling Zhang, Yingshuai Jin, Wei He, et al., "A consideration of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icroblade industri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59, 2020: 165-173. Guangliang Hou, Jingyi Gao, Youcheng Chen, et al., "Winter-to-summer seasonal migration of microlithic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cientific Reports* 10, 2020: 11659. Yu-Chun Li, Jiao-Yang Tian, Feng-Wen Liu, et al.,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y adopting barley agriculture."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6, 2019: 1005-1013.

9 参见 Kurt Rademaker, Gregory Hodgins, Katherine Moore, et al., "Paleoindian settlement of the high-altitude Peruvian Andes." *Science* 346, 2014: 466-469.

10 该遗址的发掘详情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玉树州参雄杂朔遗址 2013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1（10）：3-15。

为史前狩猎采集者反复利用的石器制造场。

二、青藏高原东部岩画的发现与研究

岩画是古代人类有意识地在岩石上绘制、凿刻的图案，这些图案构成了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所拥有的最浩繁的卷宗¹¹。青藏高原东部岩画分布较为集中，数量较多，题材内容丰富，是这一区域古代人类生活的浓缩和历史的积淀。这些岩画材料对于我们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古代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甲央尼玛院长介绍了玉树三江源岩画的发现与分布情况¹²。甲央院长重点关注了通天河沿岸岩画的分布与分期，将其大致分为源头（楚玛尔河）、中游（登额曲汇入点）、下游（称多河汇入点）三个岩画群，分别对应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岩画（距今约 3200 年）以昂然岩画为代表，普遍使用敲凿法，多是以剪影式视觉效果表现的通体凿刻，内容常见狩猎、或动物形象；中期岩画（距今约 3000 年）以江荣岩画为代表，普遍使用敲凿法及线刻法，开始流行“S 形涡纹”，内容也以狩猎、或动物形象为主；晚期岩画（距今约 2600 年）以白龙布日岩画为代表，岩画风格有了新的变化，逐渐流行以简单的几何线条来表现动物的轮廓，各种符号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上述风格的岩画的分布范围一直延续到通天河下游金沙江沿岸和四川甘孜州境内的雅砻江沿岸等地，显示了距今 3000 年前后这一地区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互动。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张亚莎教授以《青海玉树称多白龙沟塔岩画再议——青藏岩画塔图形起源初探》为题，介绍了玉树白龙沟塔形岩画的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张教授在其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白龙沟岩画中的塔图形存在方式、塔造型的多样性与年代的持续性、塔岩画的起源、演变以及与苯教的特殊关系、白龙沟塔岩画于青海玉树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塔图形主题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从白龙沟塔岩画造型的复杂多样，反复制作且多有叠压打破关系，磨蚀风化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苯教色彩占绝对主导地位等现象看，青藏高原系统岩画“塔”图形的起源地，已呼之欲出；白龙沟岩画群所在地，是通天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衔接转折之地，是两大流域岩画发生联系与中枢所在，无论在地理还是历史文化上，都具有某种特殊性；白龙沟岩画主题与样式的多样化与特殊性应该反映出青藏高原特有的

11 [法]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著，刘建译：《艺术的起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12 玉树岩画的发现与研究参见拉日·甲央尼玛：《玉树岩画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塔岩画具有本土独自发展的一条脉络，而且年代也比我们以往认知的要早¹³。

四川甘孜州新龙县教育和体育局的王裕龙介绍了拉麦岩画的基本情况，该岩画位于甘孜州新龙县拉日马镇拉麦村，起初由驻村干部发现并提供线索。拉麦岩画凿刻在一处巨大的岩面上，除靠近地表和部分区域的岩面图像比较模糊难以辨认之外，大部分图像尚可辨识，清晰的单个图像或符号大约有 200 多个，以敲凿法为主，题材包括动物、人物、几何纹样等。其制作时代可能属于吐蕃时期之前的“早期金属时代”。

岩画的图像组合是岩画研究中一个重要探索方向，国外在研究旧石器洞穴岩画时早已注意到图像组合现象，并使用岩画结构主义方法进行研究¹⁴，该方法对后期图像组合的研究具有适用性。西安美术学院的苟爱萍教授发表了题为《青藏高原东部岩画中的图像组合——以称多岩画为例》的报告，认为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岩画中，虽然动物岩画仍然以牦牛图像和鹿图像为主，但这些岩画图像中的一些组合关系则引人思考。例如在称多岩画中，鹿图像经常与牦牛图像组合呈现，塔图像与凹穴组合出现，称多岩画之中还有少量制作技法和图像风格与众不同的组合岩画，在中国其他地域很难见到，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信息，需要进一步解读研究。另外，在青藏高原东部的石渠还有老虎岩画出现，石渠的虎岩画数量虽然不多，但总是与鹿岩画等图像伴随出现。因此，研究青藏高原东部岩画中的这些经常出现的图像及其组合关系，探讨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组合图像中的具体组合方式及图像构成，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图像与青藏高原周边其他岩画图像的关系及其内涵表征，是非常有必要且有价值的。

三、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青藏高原虽然环境恶劣、交通险阻，人类文化的分布和发展总体上讲比较薄弱和滞后，但这里绝不是文明的空白区，其文化也并不浅薄和单一，由于其封闭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能够长期地在高原上延续、传承、沉淀和转化，并相互交融，使其文化面貌显得古老而厚重¹⁵。

13 白龙沟塔岩画的相关研究参见张亚莎、邹沁园：《玉树白龙沟岩画与苯教文化关系研究》，《中国藏学》2020（2）：75-83。张亚莎、邹沁园、王永军：《青海玉树白龙沟塔岩画的图像学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0（2）：117-125。

14 有关岩画结构主义方法的介绍，参见苟爱萍：《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岩画研究的启示》，《艺术评论》2016（3）：145-152。

15 霍巍、王煜、吕红亮：《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1卷：史前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1。

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的汤惠生教授介绍了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附近印度河谷的巴哈塔尔（Jhang Bahatar）哈拉帕文化遗址的考古新发现¹⁶。考古发掘揭露了一个时代在公元前近 3000 年的早期印度河谷文明，属于哈拉帕文化第二阶段，亦称科特·迪吉类型。在已经发掘的一条 2×40 米的探沟中，清理出 36 座灰坑、30 余件完整陶器，以及 1000 多件小件，此外尚有大量的动植物考古的环境制品（ecofacts）和测年标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铜器、玻璃以及费昂斯等，时代最早为在哈拉帕文化科塔·迪吉类型（ca.2800-2600 BC），经过吠陀时代（ca.1500-522BC）到孔雀王朝（ca.300-200BC）。已编号小件和样本数量千余件，计有玻璃、蚌壳、陶和费昂斯制作的手镯与珠子、陶塑动物与人像、青铜和铁制作的小刀、钉等，石器有马鞍形磨盘、球型研磨器、石叶刮削器、砍砸器、石斧等；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器型有短颈圆鼓腹罐、大瓮、钵等，多为圆底或小平底。密弦纹、三角形刻划纹、碗钵外部口沿的宽带黑彩、菩提叶纹、波浪纹的彩陶等，特别是黑白二彩的使用，很有特色。通过这次发掘，可以发现哈拉帕文化科塔·迪吉类型和青藏高原的马家窑文化以及卡若文化之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通过这三个文化之间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与印度次大陆的文化互动。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施兰英做了题为《青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中所见欧亚草原与南亚文化因素》的报告，认为史前的青海地区，处于文化交流地带，南北文化交流互动频繁。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出现了大量外来的文化因素，如齐家文化中所见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诺木洪文化中所见的土坯结构，以及金禅口、长宁等遗址中出现的砷铜制品，都体现了青海地区与欧亚草原及南亚之间的密切联系。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宗喀·漾正冈布教授发表了题为《欧亚腹地游牧文明视域下的吐蕃特拂庐文化——以中古文献和当代青藏高原东部的田野资料为中心》的报告。“拂庐”是中古汉语文献中对古藏文与古典藏文 བྱེ 的记录。近现代汉语称之为“西番黑帐房”或“黑牦牛毛帐篷”等，英文等西方文献中通称“Nomadic Black Tent”“Tibetan Nomadic Black Tent”等。这种由黑色牦牛毛编织而成的拉伸型建筑（Tensile Architecture），作为欧亚草原，尤其是欧亚高原腹地传统游牧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曾普遍流行于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世界屋脊”及其周边游牧区，是世界游牧帐篷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吐蕃特类型）。宗喀教授通过实地调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16 该遗址基本情况介绍见施兰英、水涛、向其芳等：《在印度河谷遥望河湟文化——巴基斯坦巴哈塔尔遗址发掘记》，《青海日报》2021 年 4 月 16 日第 007 版。

利用相关文本、文献材料，对拂庐的名与实、拂庐在世界游牧帐篷史及欧亚腹地游牧帐篷谱系中的独特地位做了简要考察，细致记录了拂庐的相关构造及类型，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型拂庐的编织流程、搭建流程与搬迁过程，为关心游牧文化的人们提供了拂庐的一手基础性资料。

中国国家地理特约记者王心阳以《不丹和他的手工纺织传承》为题，介绍了不丹的手工纺织艺术。在不丹东部旅行，常能看到女人席地而坐，腰间系着熟皮连着卷布轴，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双手或穿梭或用骨针将不同色彩的纬线引入经线，然后用纬刀使力打紧，形成纹路和图案。只有来自不丹东部伦策和扎西岗的妇女擅长用古老原始的腰机织这种图案繁琐复杂的织物。织机的宽度和人的体宽差不多，即 50 多厘米。立在前面的机架将经线撑成一个直角三角型，周长约 2.5 米。纱线则是从中国来的桑蚕原色线，用植物或矿物染料染成各种色彩。女性传统服装其拉是由三幅手工纺织品横向拼接成一匹长方形织物，长约 2.5 米，宽约 1.6 米。男人的幅是四匹长条花纹或者小方格花纹的织物，以棉为主，有时会用丝线做提花的花纹。女人在日常劳作时不会穿丝织其拉，而是穿与男人一样的方格棉布或者用野生柞蚕粗丝织的细条纹布。直到 20 年前，绝大多数不丹人还是穿着家织布的传统服装。国王颁布的法令，要求所有不丹公民，不论民族，只要是公共事务服务者，和所有前往政府机构建筑、寺庙和宗堡的不丹人，均要穿民族服装。男人们在幅之上要披一条 4 米长的披巾，女人们另一件饰物是叫拉楚的肩带。无论进入宗堡、寺庙、觐见王室，还是在乡村节庆期间聚会舞蹈和迎接远方来客，他们都把拉楚斜披在肩上。这样的规定使手工纺织的传统技艺不是停留在历史和文物上，而是贯穿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四、佛教艺术中的石窟、文本与图像

佛教遗存研究是青藏高原历史、考古与艺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本次论坛中，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发言占总体比重最大，与此有关的讨论也最为热烈。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发表了题为《青海玉树州藏传佛教文物考察成果初步汇报》的报告，介绍了其团队在玉树囊谦、称多、杂多三县调查发现的藏传佛教遗迹。此次调查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藏传佛教遗迹，其中尤以在囊谦的发现最具代表性。当地发现的古代石窟寺、佛塔、擦擦、壁画以及寺藏文物都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其遗迹与可移动文物的年代从公元 12、13 世纪一直到清代，展示出这一地区丰富的艺术特点。此次考察在杂多县和囊谦境内的澜沧江流域、称多县境内的通天河流域都发现了大量的佛

教遗迹，部分佛教壁画的年代甚至早至后弘初期，这种现象值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综合目前的发现，至少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作更进一步的工作：首先，这一地区是后弘初期重要的佛教中心与佛教艺术中心，这一点此前学术研究方面基本是个空白，现在的发现证明至少有一部分壁画的年代可以早至 12 世纪，即后弘初期；其次，这里的艺术风格具有丰富的融合色彩，受到波罗艺术、尼泊尔艺术以及西北地区艺术（比如河西地区）的影响。至少在 15 世纪前后，其影响已经遍及金沙江两岸。虽然目前我们对于其早期艺术风格的来源尚不清楚，但是这一发现对于认识藏传佛教艺术东传的复杂性有很大的帮助。

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卢素文发表了题为《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加瓦仁安吐蕃摩崖石刻的调查与研究》的报告¹⁷。加瓦仁安吐蕃摩崖石刻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灯龙乡帮帮村，石刻包括五尊像和两组藏文题记，其中一则藏文题记中刻有“灭恶趣神咒”。从藏文题记和图像特征判断年代为 9 世纪，题材为普明大日如来与四供养菩萨。以往认为川青藏交界地带的摩崖石刻题材基本为胎藏界大日如来，该组造像和题记表明《恶趣经》中的普明大日如来也有出现。两种大日如来图像在吐蕃皆有出现，为进一步厘定吐蕃佛教图像中未识别的题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该处石刻的发现为研究吐蕃时期的佛教题材提供了新素材，说明胎藏界大日如来和普明大日如来皆在吐蕃时期流行，并非只有胎藏界大日如来一种，造像表面的遗迹现象，可以认识和了解过去敷泥涂彩的修复步骤，石匠名称的题记也为研究川青藏地带造像工匠团体提供了新的资料。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长虹发表了题为《青海玉树发现的吐蕃时期古藏文刻经》的报告，将目光聚焦于青藏高原东部玉树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佛教摩崖石刻。这批吐蕃时期的佛教石刻主要分布在玉树勒巴沟和贝沟¹⁸，除了佛教的图像外，与之同出的还有石刻佛经，据目前调查，可判定内容的有《无量寿宗要经》《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普贤行愿王经》《大日如来及众眷属赞》等。这些佛经的刻写在字体上

17 参见卢素文：《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加瓦仁安吐蕃摩崖石刻的调查与研究》，待刊稿。

18 调查简报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16 辑，2017（1）：63-9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16 辑，2017（1）：95-14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16 辑，2017（1）：149-16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20 辑，2019（1）：1-69。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崖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 20 辑，2019（1）：69-101。

具有古藏文的书写特点，与西藏本土发现的吐蕃碑刻有类似之处，甚至有些还有纪年题记，是重要的吐蕃时期的刻经。在分布上，这些刻经地处交通要道，位于山崖底部，方便信众观摩、顶礼。在形式上，这些佛经与佛传故事、十方佛、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等图像题材同时出现，其所反映出来的佛教面貌、修行仪轨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普贤行愿王经》深受吐蕃王廷推崇，被广泛刻写、传抄于唐蕃古道、丝绸之路，也被绘制在传统普贤变下方的屏风画中。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张延清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上流传的〈普贤行愿王经〉》的报告，认为《普贤行愿王经》是吐蕃时期才出现的新题材，由于受到广泛信仰，此经在赞普诏令下，由吐蕃译师无分别翻译为汉文，此经甚至可以纠正汉译本因母本原因而出现的错行失误。从此经的传播、互译反映出唐代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上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盛况，也体现出藏、汉民族自古以来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印迹。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杨清凡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吐蕃时期的带柄香炉图像：藏东与敦煌文化交流侧议》的报告。她在田野考察及对相关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在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遗存中，有多处石刻造像供养人手中所持供具为长柄香炉，与之类似的图像还可见于敦煌吐蕃时期的壁画及其他绘画中。故其对吐蕃时期此类带柄香炉的造型、使用者、使用背景等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传播的相关问题，为藏东吐蕃佛教遗存与敦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些具体例证。

敦煌历史上的中唐时期（781-848年），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是敦煌石窟艺术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时期，“重构”与“原创性”几乎成为此时敦煌艺术最显著的字眼。无论是在石窟建筑方面、壁面布局和新题材方面，还是石窟艺术风格方面，中唐的敦煌都打破了盛唐以前的一系列传统，形成了敦煌石窟艺术史的一场重要“变革”。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研究员在其报告《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中唐变革》中对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几个重大变化，如受桑耶寺“三样式”影响的石窟的塔窟垂直组合结构，壁画的流行题材与五台山图等新题材，经变有规律的对称布局，屏风画成为叙事的重要载体，汉风、吐蕃风与印度尼泊尔风格在敦煌的同时出现，供养人在位置、姿态和服饰上的新变化，洞窟的功能、主题与仪式空间的营造，南区北端石窟群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梳理，重点讨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佛教与社会思想因素。在吐蕃统治敦煌后期，这些变化最终形成了敦煌艺术的中唐传统，并对归义军时期以后的敦煌石窟产生了持续影响。

汉传佛教美术中的许多图像具有强烈的本土特征，文殊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故宫博物院张雅静研究员带来了题为《汉传佛教文殊菩萨图像的中国化及其流变》的报

告。在对汉传佛教的文殊图像进行梳理后，她认为文殊之名及相关经典毋庸置疑来自印度，但是其尊像在汉传佛教当中，从出现伊始就是中国化的形象，而不是印度佛教图像影响之下的产物。印度佛教在9世纪前后出现了文殊像，并随着佛教，尤其是密教的传播对汉文化产生影响，汉地的文殊像开始逐渐加入印度元素。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印度的文殊像出现之前，汉传佛教中已经创造出中国化的文殊形象，表现出中国佛教美术极具创造性的一面。在印度的文殊像传入中土之后，又善于吸收外来因素和文化，从而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佛教美术面貌。

9世纪中期，吐蕃王朝的崩溃使得西藏历史上出现了近百年“黑暗期”，该时期的艺术形态、吐蕃艺术与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艺术之间的关系一度成为艺术史研究者难解的议题。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王瑞雷研究员发表了题为《西藏后弘期初佛教艺术对吐蕃佛教遗产的继承与延续》的报告，基于对西藏东部及敦煌蕃据时期吐蕃佛教艺术的调查和近年来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藏文文献史料中对吐蕃佛教和吐蕃服饰礼仪的相关记载，以及近年来青海都兰热水1号大墓和血渭1号大墓出土吐蕃文物，通过对卫藏地区后弘期初所建夏鲁寺、扎塘寺、汤加寺、姜浦寺等现存造像壁画和摩崖造像的调查，从题材内容、图像配置、风格特征、服饰礼仪装饰等层面观察西藏后弘期初佛教艺术是如何承袭吐蕃佛教遗产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因。

北京服装学院邱忠明教授发表了题为《图像的逻辑：细读一件北齐青州胡人图像》的报告，邱教授以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的一件北齐佛衣上彩绘的胡人形象为中心¹⁹，辨识出最接近中心的二位（即左、右领头者）均手持莲花。结合该地区和邺城、并州等地同时期，乃至更长时段的丝路沿线的佛教艺术、墓葬艺术、碑志与文献等材料，认为这几位胡人的身份为此像的供养人——以粟特人为首的国际化商队的代表，此图式应为一支粟特商队礼佛的场景。这说明北齐青州亦为胡人商队流寓之地，中古中国丝绸之路似可向东延伸至山东半岛，而粟特人的信仰除了原本的祆教外，具有相当多元的维度，其中佛教是重要的一维，并且粟特人在佛教的传播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青藏高原东部的交通与路线

西南民族大学的杨铭教授发表了题为《天宝初年（746-749）唐蕃剑南西山战事考述——以〈唐故工部尚书郭虚己墓志〉为线索》的报告，检索相关金石碑铭以及文献资

¹⁹ 该处佛教造像参见青州博物馆编著：《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料，以墓志所载为线索²⁰，讨论了天宝五载至八载之间，由郭虚己统领、鲜于仲通等参与的剑南西山系列战役，涉及行军路线、战役地点、重要人物等，以及这些战事对唐蕃关系的历史影响。

1858年，拉萨代牧主教杜多明、川东南代牧主教范若瑟及川西北代牧主教马伯乐主持川藏两地教区进行勘界，使拉萨代牧区教界扩展至四川境内。针对这一历史，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刘瑞云副教授发表了题为《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川藏教区首次勘界史考》的报告，认为其是教会内部支持进藏传教之激进派同反对进藏传教之保守派之间数年博弈的结果，从侧面反映出教会内部激进、保守两派之间关于扩大在华传教活动之分歧与纠葛，预示着巴黎外方传教会日后在四川西部近百年传教活动的艰难与波折。

青藏高原东南缘有横断山系纵贯南北，自古以来巴蜀先民在高山峡谷之中开辟出商贸通道、民族走廊，将中国西南地区与世界相通连。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西道（灵关道）之临邛道，自临邛（今邛崃）起，分两路：临邛-芦山（大川）、临邛-雅安（上里）。由临邛经油榨、南宝，往西北至芦山（大川）这条线，是临邛古道主线。1869年法国学者戴维，沿此路从成都出发到达大川，自大川翻越山垭到达木坪（今宝兴），在木坪修道院附近山林发现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这条古道，因戴维发现大熊猫之旅而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有称“戴维之路”。近年来，戴维发现大熊猫这段历史随着当地旅游开发而被重新发掘，但曾有人撰文误以为戴维之旅是由成都、雅安、宝兴这条路线，并以茶马古道为楔子作文学性发挥，此说又经人反复转抄，乃至官修史志也错误记载。对此，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张丽萍教授发表了题为《临邛古道与戴维之路考论》的报告，通过发掘和运用外文日记、地方文献材料，并通过实地考察，对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旅行路线进行考证，以厘清被混淆的历史事实。

六、三江源区的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这一时期气候增温也最显著，二者的综合作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最大，但影响的幅度、范围和后果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唐亚教授的报告《长江源

20 该墓志基本情况参见樊有升、鲍虎欣：《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文物》2000（10）：85-90。

区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策略》认为,地处青藏高原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我国环境安全、生态安全、水安全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多年的线路和重点区域考察、入户调查、随机访谈和重点访谈揭示,在气候变化、国家政策及社会经济综合驱动下,长江源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人文生态系统、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有助于区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但也有明显的挑战。充分发挥区域独特资源及其在流域及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发展基于独特资源的产业体系,考虑当地在区域平衡发展中享有权益分配的合理诉求,对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及维护该区域在长江流域及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野生动物保护是三江源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不同的环境主体背后有着不同的实践逻辑。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徐君教授发表了题为《话语、权力与实践:三江源区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路径研究——以青海玉树曲县野生动物保护为中心》的报告,基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曲县的田野调查,从一个社区共管协议开始梳理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多方合作的历史,探讨环境国家、生物多样性话语和传统生态道德如何共同促进了牧民的具体性保护实践;同时考察在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取得不错成效的现实下牧民生活又如何受到野生动物的影响;强调在多方环境主体之间话语交织的现实下,需要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和未来,构建三江源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合力。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工作步入正轨。文件明确指出,既要保护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又要为公众提供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以彰显国家公园的公益属性和全民共享性。游憩是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在国家公园语境下,“游憩”与“旅游”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锦教授发表了题为《国家公园游憩活动与玉树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文化体验》的报告,认为玉树州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和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结合区,在具体实践中,要将人流量较大的旅游活动调整为国家公园自然和文化教育活动,改造为人流量均衡,但时间较长的国家公园游憩活动,建立一套基于自然和文化体验双重功能的游憩功能分区、业态发展、设施建设、评价、主体、环境影响及管理评价体系,从而体现玉树州文化与自然的双重保护特征。

七、小结

经过两天的学术研讨，10月19日下午5时，“青藏高原东部研究暨玉树历史遗迹学术论坛”圆满落幕，闭幕式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研究员主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永宪教授做了大会总结发言。此次论坛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玉树藏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会议的顺利召开达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多学科、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本次论坛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学术交流的阵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青藏高原东部历史、考古、艺术、宗教、经济、交通等方面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与中原地区相比，青藏高原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资料的积累十分薄弱，考古材料也较为零散，使得以往我们对于该区域的研究和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明显不足。近年来，随着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考古工作者不畏艰辛的付出，这一局面有着明显的改善。本次论坛有数位学者介绍了各自的考古新发现，如汤惠生教授对巴哈塔尔哈拉帕文化遗址的发掘、张冬菊教授团队在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和西藏邱桑遗址的新发现与新进展、胡越博士在彭卡拉玛地点的试掘、韩芳博士对参雄孕朔遗址的发掘、罗文华教授及其团队在玉树地区对佛教遗存的调查等，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一手资料，对这一区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若干史前重大历史问题的阶段性进展。随着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工作的推进和考古资料的积累，我们逐渐能够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给出回应，并取得阶段性进展。如张东菊教授等人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早期人群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能力、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分布范围等问题的探索，以及吕红亮教授对人类从何时、何地进入青藏高原并永久定居等问题的思考。近期报道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等考古遗存的发现，为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历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证据，也为我们探讨青藏高原若干史前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支撑。

3. 研究视野的拓宽与拓展。此次论坛与会学者学术报告涉及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视野非常宽阔，讨论的主题并非局限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其辐射范围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及四川、青海、甘肃等邻近地区，甚至还包括一些境外的学术研究，例如汤惠生教授在巴基斯坦做的考古工作和王心阳对不丹手工纺织的介绍。青藏高原地处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其古代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今后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应当秉承这种国际化的眼光和宽阔的视野。

4. 多学科的交流、互动与综合运用。此次论坛发表报告的演讲者分别来自不同的研

究领域，具有多样的学科背景，既有从事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的学者，又有科技分析、资源环境等多种前沿领域的专家。本次论坛，形成了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多种研究方法相互借鉴的研究趋势，奠定了青藏高原历史研究的基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5. 区域研究特色愈发彰显。本次论坛学者们的发言内容愈发彰显青藏高原东部这一区域的研究特色：一是岩画艺术研究，如甲央尼玛对玉树三江源岩画的考察与研究、张亚莎对玉树白龙沟岩画的在探讨、苟爱萍对青藏高原东部岩画图像组合的分析、王裕龙对拉麦岩画的报告等；二是佛教遗存研究，如罗文华在囊谦等地的调查与研究、卢素文等人对加瓦仁安吐蕃摩崖石刻的调查与研究、张长虹和张延清对玉树吐蕃时期古藏文石刻的研究、张雅静对文殊菩萨图像的研究、杨清凡对吐蕃香炉图像的报告等；三是交通路线研究，如杨铭对郭虚己行军路线的考订、张丽萍对“戴维之路”的考证和刘瑞云对川藏教区首次勘界的考证等。虽然有关上述热点问题的研究已颇具数量，但是研究比较分散，不成体系，缺乏系统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的强化和深入。

◆ 祝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ABSTRACTS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Texts

Saerj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various narratives and related works on the Buddha's first discourse on turning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this paper surveys cognate descriptions in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It especially focuses on two Tibetan texts entitled the *Dharmacakra (pravartana) sūtra* that are preserved in the Kanjur. The essay points out that one work, the **Dharmacakrasūtra*, is not an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but an extract from the *Samṣhabhedavastu* of 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 Yet another work,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ravāda Buddhism.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dac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works.

A Glimpse of the Battle between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Details from the Excavated Epitaphs

Wei Yingchun and Ma Zhenyi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The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four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related to Hexi 河西 in Tang Dynasty, while making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rec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Tibetan literature and other records, it aims to reproduce several details of the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The Battle of Yumen 玉门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was recorded in the “epitaph of Li Li” 李礼墓志, which has not been attested elsewhere. The “epitaph of Yu She” 鱼涉墓志, records the tragic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Qilian City 祁连城, and that the tomb owner Yu She died on the day of victory, which can be supplemented with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tained in epitaphs may be helpful to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elong 河陇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and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Expedition ——On the Tang-Tubo Relat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Zhongzong

Yuan Enda and Lu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ng Jiuzheng's 唐九征 southern expedition was a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ang Zhongzong (r.705-710). The historical records pertaining to these events are relatively brief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leaving gaps in our understanding. But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召弘安 housed at the Tang West Market Museum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is epitaph,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primary target of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military campaigns was the tribal groups in the Yaozhou 姚州 region,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present-day Yao'an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These expeditions had limited,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Tubo. Furthermore, during the southern expedition of Tang Jiuzheng, both the Tang and Tubo made concessions to maintain their relationship, but the Tibetan side made larger concessions than the Tang. This suggests that, despit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ongzong, Tubo was still in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ir practical interactions.

An Exploration of Reasons of Geshu Han's Recapture of Shibaocheng

Li Xued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twenty-ninth year of Emperor Xuanzong's reig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741), Tubo launched an attack on Shibaocheng 石堡城. Recognizing its crucial strategic importance, starting from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ianbao era (745), the Tang court successively appointed Huangfu Weiming 皇甫惟明, Wang Zhongsi 王忠嗣, and Geshu Han 哥舒翰 to lead military campaigns to manage Shibaocheng. Ultimately, Geshu Han defeated the Tibetan forces and brought Shibaocheng back under Tang control. During Tianbao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n increasingly intens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Prime Minister Li Linfu 李林甫 and Crown Prince Li Heng 李亨. Although Huangfu Weiming and Wang Zhongsi were loyal to the Crown Prince and were stationed in the borderlands, they could not stay aloof from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e successive military campaigns launched to recover Shibaocheng were affected by the power struggle at the imperial court, resulting in Tang forces returning without success. Geshu Han, as an outsider of the court politics, due to his background as a minority leader, was able to avoid the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ower struggle on frontline military operations. Additionally,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general Abusi 阿布思 and Li Linfu shielded this campaign from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rivalries. Furthermore, Geshu Han had a relatively strong military force when he attacked Shibaocheng. The Tang army had already launched an offensive against Momi Cheng in Jiannan which distracted Tibetan forces and provided support for Geshu Han's campaign to retake Shibaocheng. This strategy ultimately led to the successful recovery of Shibaocheng. After the battle, Geshu Han gradually built a defensive system centered around Shibaocheng, thereby strengthening its defenses.

A Study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Zhang Xu and Zheng Hongxia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 seri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ibet, making him an influential figure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ang-Tibetan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Zhol* Pillar, Klu khong's rise in government positions was marked by a series of promotions due to his role in reporting and suppressing rebellions. He was initially appointed as *nang blon* and later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chen po* and *yo gal 'chos pa chen po*. But Klu khong faced a challenging path to his advancement, as he did not come from a noble background and adhered to the Bon religion, which created obstacles for his career. Despite the triumph of the capture of Chang'an, Klu khong did not receive further promotions and, in fact, experienc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stagnation in

his official career. Over a decade later, he reemerged in the public eye and assumed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and *yo gal 'chos pa*, holding one of the highest-ranking positions in the Tubo court, second only to the *Blon chen*. This was the highest office he held throughout his career, as he never served as the *Blon chen*.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in the Treasure Text Titled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Yang Jie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ng cruc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reasure tradition, Nyang ral Nyi ma 'od zer and his famous treasure cycle *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 have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Following in the steps of earlier research that has illuminated the origins of some of the tantric texts in this cycle,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within the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 a doxographical work that also belongs to this cycle.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what becomes clear is that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its Indian precedent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dox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Nyang ral's time. In the author's view, this nominally revealed treasure text obviously absorbs the doxographical framework prevalent during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nd is quite important for our further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xography of that period.

Gri gum btsan po and the Bon Treas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 Analysis of Sga ston's (14th C.) *History of Bon Treasure*

Naljor Tsering

(Doctoral Studen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SL, CRCAO)

The treasure text or *gter ma*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is mainly popular in the Buddhist Nyingma school and the Bon tradition in Tibet. Bon *gter ma*-s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1th century, and a spe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regarding their burial, discovery, and transmission already took shape in the 14th century. The origin of a given *gter ma* and the reason for its transmission usually constitute the very first topics to be explained in these narratives. Regarding these topics, Nyingma scholars usually provide the story of Padmasambhava a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Tibetan Buddhist *gter ma*-s whereas the Bon tradition connects its origin to the two transition periods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also known as the two “extinction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B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irst extinction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n, that is, the story of the eighth king *Gri gum btsan po*, as a case study and explores how the later generations of Bon scholars use legends and stories regarding the period of the Tibetan Empire to construct *gter ma*-origin stories for their own tradition.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story,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the Bon *gter ma*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Bon doctri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inspiration it received from the Buddhist narrative (on the “extinction of dharma”), while inheriting many unique indigenous elements and cultural contexts.

从娘热·尼玛沃色所掘《八教善逝集》来看早期《四普巴续》及其与远传法及伏藏法统之间的关系

凯西·坎特维尔

(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娘热·尼玛沃色在十二世纪所掘出的《八教善逝集》(*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成为了宁玛派以八密教尊神为核心修行的范本。在此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八教善逝集》中关于“事业普巴”(*'phrin las phur pa*)的部分可能形成于娘氏之前的时代,并保留了古时的修习传统。本文结合远传法(*bka' ma*)文献中属于娘氏传承的教法,进一步对这些与《四普巴》或《四普巴续》(*phur pa'i rgyu bzhi*)相关的普巴文献进行探讨。《四普巴续》教法在这些文献中的中心地位很可能影响了此后的金刚普巴传承,因为它们也强调这些教法的重要性。本文主要探讨远传法和娘氏法中的《四普巴续》教法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早期四普巴教法之间的联系。《堡岩》(*rdzong 'phrang*)中只有《八教善逝集》是很早期的,而四普巴中的一篇简短教言很有可能是源自历史上的莲花生大师。此外,《四普巴续》中引用的同一主题也被收录进了《八教善逝集》中的权威文献。娘氏将《八教善逝集》称为伏藏,使得藏王墀松德赞被重新纳入该传承体系之中。墀松德赞原本并未在此传承序列之内,而是作为《堡岩》的主要授记对象而被新加入的。因为娘热是墀松德赞的转世,《八教善逝集》伏藏中的关键文献据称是来自墀松德赞的写本。

以药为经：医药伏藏中的炼金术与藏地的佛教医学

麦伟哲

(美国纽约大学)

伏藏师在伏藏文献中能够以叙事的方式建构宇宙观层面的教说。如藏地的医师与仪轨师多将服石法 (*bcud len*) 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伏藏法, 是佛陀原初的教法, 或是藏地医学的经典。本文旨在对藏地的医药伏藏进行简要介绍, 尤其是以相传为袞邦达沃 (*Kun spangs zla 'od*, 又名 *Kusasmanpa* 或 *Sku sa zla 'od*) 所传之《因陀罗手服石》(*Dbang po lag pa'i bcud len*)、《阿育吠陀》及《医学四续》等文献中的相关教法为中心来解读, 将这些医药文献构建为佛教经典的叙事框架。总的来讲, 本文提出医药经典不一定总是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过去, 而是以叙事来规范其所期许的起源。与此类似, 在佛教医学中, 医学理论与实践指导也成为了诸佛的教诲, 疗愈与菩萨戒相融合, 医药也成为了成佛之道。将药书作为佛典来解读, 便可以将医学实践根植于一个叙事所创造的世界中。本文探究了佛教医药伏藏的叙事世界, 并讨论了其在后弘期 (约 950-1250 年) 兴起的历史背景。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s Speech as a Source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Sun Penghao

(Doctoral Student, Harvard University)

Inquiries into the textual sources for O rgyan gling pa's influential treasure cycle, the *Bka' thang sde lnga*, have long fascinated scholars. It is now widely accepted that it contains authentic ancient materials.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passage in the twenty-ninth chapter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as being an adaptation of a speech preserved in a fourteenth-century biography of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 (1230–1309).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lies hidden, as O rgyan gling pa transfers U rgyan pa's diction and metaphors from its original context into the mouth of the legendary eighth-century figure Padmasambhava. Furthermore, the speech was modified from a general defense of the traditions of Rnying ma, *gter ma*, and Zhi byed traditions to a specific defense of the *gter ma*. This identification not only adds a fourteenth-century material to the current pool of the known textual sources of the *Bka' thang sde lnga*, but it also gives us an example of creative textual reuse and the microscopic manner of in which this treasure-revealer compiled his work. Furthermore, the inter-textuality offers us a rare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readership and reception of U rgyan pa's biography, as well a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polemical rhetoric in general.

The Impact of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s (1597-1652) *Gter ma* lineage on the Religious Patter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nam rgyal Dynasty of 'Bras mo ljongs

Xu Yuanqin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ree great masters belonging to the Rnying ma school,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1597-1652), Mnga' bdag Sems dpa' chen po (1591-1656), and Kaḥ thog Rig 'dzin Chen po (17th C.) empowered Phun tshogs rnam rgyal (1604-?) as he was enthroned in 1642 to become the first religious king (*chos rgyal*), also Rnam rgyal, of 'Bras mo ljongs or 'Bras mo gshongs, that is, Sikkim. This opened the path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nying ma pa gter ma-revelatory tradition,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of Ü-Tsang to the southern region (*lho phyogs*), Sikkim.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w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itial transmissions of this tradition, which he had received from the great *gter ma* master 'Ja 'tshon snying po (1585-1656). Upon his enthronement as religious king, Phun tshogs rnam rgyal supported the propagation of Lha btsun's tradition throughout 'Bras mo ljongs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at would be affiliated with it.

In the process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Bras mo ljongs, there was a continuou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religious authority of Ü-Tsang and Lha btsun's tradition. This gradually formed a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lineages of transmission, sectarian affili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in monasteries and branches. The influence of this *gter ma* tradi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early Rnam rgyal dynasty in 'Bras mo ljongs.

Prohibition and Recognition: Dissemination of the *Gter-ma* Literature of the Nying ma School in Mongolia (1607-1738)

Giigch Borjigin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ibetan Buddhism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Mongolia through the spread of the Gelugpa School, which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undoubtedly has a strong Gelugpa presence,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are mostly written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began to dominate Mongolia,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other schools are very rare. Howeve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was introduced to Mongolia, other schools also spread in Mongolia. In this article, I will survey the literature of the Nyingma School that wa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to Mongolian from 1607 to 1738, and explore three

types of non-canonical texts dealing history, ritual and commentary, and thus provide an outline of an enhanced picture of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叙事生活世界：《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与伏藏的社会功能

娜塔莎·麦克斯

（美国德州州立大学）

本文以《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篇为例，探讨伏藏在创建一个“叙事生活世界”（这一理论是本文作者专门在此提出并使用的）中起到的社会功能。正如霍莉·盖利（Holly Gayley）、戴维·杰玛诺（David Germano）及其他人所指出，伏藏并非单独存在的现象，而是由复杂的社交互动连接过去与未来而形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网络。伏藏师通常被认为是文化英雄：他们以过去的意义来涵盖当下的时代，并通过他们与过去的联系建构出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宇宙。格萨尔史诗传统尽管在藏地解读中很少被认为是伏藏，但是其传承与伏藏传承多有相似之处，其中最显著的即是经启示而被发现并创制出的新文献范式，这一范式有着超越原初讲述的社会影响。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只有一份格萨尔文本自我认同为伏藏，即由丹喇嘛·却吉旺秋（'Dan bla ma Chos kyi dbang phyug）所著、格萨尔伏藏师扎册多吉（Drag rtsal rdo rje）掘出的《地狱救母》篇。通过对比阅读这一格萨尔传承与伏藏传承所重叠之处，学者们可以通过格萨尔传承来更清晰地解读伏藏的社会功用。在介绍这一重要文本之上，本文更提出通过伏藏基于一个持续有意义并有效的过去而建构出的叙事生活世界，这让个人得以与这一叙事创造出来的过去产生联系，并能在其中构建出自己当下有意义的世界。叙事生活世界因此便成为了伏藏在当代西藏取得社会关切和关联的驱动力。

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Yushu*

Zhu Ming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Yushu prefecture and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ichuan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e Heritage of Yushu" in Chengdu from October 18 to 19, 2021. This symposium received a total of forty papers and nearly one hundred representatives from Beijing, Qinghai, Sichuan, Hebei, Gansu and Shaanxi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re were twenty-seven scholars who delivered presentations during eight sessions, focusing on topics such as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early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rock art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Grottoes, images and texts in Buddhist art", "Transportation and rout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origin region of the Three Rivers", etc. This symposium provided a level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greatly promoted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